

毛泽东与南通籍仁人志士的交往

□晓宇



1956年,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亲切接见张敬礼(左)



20世纪50年代,陈长江(左一)跟随毛泽东出行。

名与南通 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专栏

毛泽东(1893—1976),湖南湘潭人。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,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战略家和理论家,中国共产党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,诗人,书法家。

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,与多位南通籍仁人志士有过亲密的交往。

1926年5月,崇明县(当时崇明隶属江苏南通)进步青年陆铁强、俞甫才来到广州,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。其中“中国农民问题”“农村教育”等课由毛泽东亲自讲授。毛泽东得悉陆铁强、俞甫才来自江苏崇明,专门约见他俩,深入了解江苏农民生产、生活的状况,特别询问了当年崇明西沙佃农抗租暴动的情形。毛泽东边听边记,并不时插问。1926年10月25日,中共中央机关报《向导》第179期,发表了毛泽东署名润之的文章《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》。文章以江苏崇明为例,深刻揭露了地主贪婪的本性,详细介绍了佃农艰辛的生活,高度赞扬广大农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。

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,陆铁强、俞甫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学习期满后,陆铁强、俞甫才遵照党的指示,回到家乡,发动农民群众,开展抗租斗争。陆铁强、俞甫才分别于1927年9月和12月先后担任中共海门县委书记,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相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施方白和沈维岳都是江苏启东人,施方白是中国同盟会会员,中国国民党早期党员。沈维岳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,受周恩来、恽代英的影响,倾向中国共产党。

1938年春,经周恩来、董必武介绍,施方白、沈维岳二人长途跋涉,来到延安。在延安,施方白、沈

维岳先后受到毛泽东的三次接见,并参观了边区政府、医院、学校等处,对革命圣地延安充满了新奇和崇敬。在第三次接见时,毛泽东对施方白、沈维岳提出希望。毛泽东对施方白说:“工作地点可以不拘,但应该注意教育事业,尤其要与青年们联系,如遇优秀青年,可介绍到陕北公学或抗大学习。”毛泽东对沈维岳说:“抗大学生毕业后大部到敌后进行抗战,你既是黄埔同学,学过军事,抗战意识又很清楚,就不必参加抗大学习,还是回到沦陷的家乡,组织游击队,进行敌后抗战。”临别时,毛泽东为施方白亲笔题词:“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,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革命,即实现更进步的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。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,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统一战线里面,才能达到目的。”

施方白、沈维岳在延安直接聆听领袖的教诲,坚定了革命意志,也极大地鼓舞了家乡人民抗击日寇的斗志。新中国成立后,施方白曾任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委委员长。沈维岳曾任中共南通市委统战部副部长,政协南通市委员会副主席。

二

新中国成立初,毛泽东在宴请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时曾说,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,有四个人不能忘记。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,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,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,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。

张敬礼是张謇先生的侄子,著名爱国民族实业家。1936年,张謇之子张孝若不幸遇害,张敬礼成为张氏家族的继承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,张敬礼带领大生纱厂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,在江苏乃至全国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。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和宴请他。

1956年2月1日晚,毛泽东、周恩来在怀仁堂举行宴会,招待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委员。张敬礼被安排在第一席,坐在毛泽东的身旁。毛泽东和他谈起了

张謇,并询问大生纱厂规模、工人人数和公私合营的情况。毛泽东说:“公私合营的优越性,你是亲身体会到了,可以向大家多谈谈。”

这年春天,全国形成工商业公私合营的高潮。张敬礼代表江苏去北京报喜。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主席台上,毛泽东接受了张敬礼递交的报喜信,并与张敬礼亲切握手。后在中南海紫光阁又听取了各地工商界代表的汇报。在张敬礼代表华东区汇报时,有人问“敬礼”两个字怎么写。毛泽东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,风趣地说,就是写信的时候用的此致、敬礼的“敬礼”两个字。

三

毛泽东还与如皋籍著名学者冒广生有过一段交往的佳话。冒广生,字鹤亭,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。1957年初春,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。6月,应陈毅之请,冒广生撰写了《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》。文章见报后,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来到冒广生住所采访,写了一篇专访《八五老人一席话——访冒广生先生》,此文也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登载。

195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毛泽东派车接冒广生去中南海。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,只见毛泽东早已等在门前,并趋步向前迎接,与冒广生握手问好。让人书房后,二人叙谈良久。话题谈到时局时,毛泽东说:“你们过去提倡革新,我们后来号召革命,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,是一条道路上的人。”冒广生一时感到如沐春风。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,这时冒广生将自己的著作《疚斋词论》《宋曲章句》《四声钩沉》《倾杯考》四大本赠给毛主席。毛泽东接过书十分高兴。临走前,毛泽东问冒广生:“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?”冒广生坦然说:“现在党内正在整风,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,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,譬如一头雄狮,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。古人云:蚯蚓虽小,为害亦大焉。可得提防呀!”毛泽东听后连声称:“讲得好,讲得好,我一定记在心里!”冒广生起身

辞别,毛泽东亲自送他上汽车,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,怕他碰了头。此情此景令冒广生终生难忘。

四

在毛泽东的83年人生旅程中,有位警卫战士跟了他27年,他叫陈长江,是地地道道的海安人。陈长江1946年8月参军,1949年3月入党,参加大小战斗30多次,因为作战英勇,不怕牺牲,数次荣立战功,曾被评为泰州军分区劳动模范。1950年1月,陈长江被选调到中央警卫团(8341部队)1营1连工作,负责中央最高首长的安全警卫任务。陈长江在毛主席身边长达27年的安全警卫工作中,历任警卫员、分队长、区队长、中队长、副大队长、副师职参谋等职。1962年,毛主席身边撤销卫生科长后,由陈长江带领的警卫中队接替,全权负责毛泽东的警卫、日常生活等。毛泽东十分喜欢陈长江的机灵和忠诚。警卫毛泽东,陈长江对自己的夫人张秀玲都保密了20多年。如果不是偶尔在一部纪录片中,张秀玲看到自己的丈夫给1972年来华访问的尼克松拉车门,她还一直不知道,老陈已经在毛主席身边默默工作了22年。

毛泽东虽然一生没有来过南通,对南通却不陌生。1952年4月,陈长江到中南海丰泽园门口站岗,第一次邂逅毛泽东。陈长江刚一开口,毛泽东就面有喜色地对他说,“你是苏北如皋海安一带的,对吧?”毛泽东又说,你们那个地方,抗战时期,解放战争时期都打过不少仗啊!第一次见面,毛泽东还夸陈长江的名字取得好:“长江,这是中国第一大江,你这个名字好记。”

除了当好警卫,到老家进行“农村调查”,为毛泽东提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,也是警卫战士的一项重要的工作。从20世纪50年代起,陈长江不止一次被毛泽东派回到海安老家进行农村调查,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调查中的所见所闻。毛泽东经常跟陈长江说,“最近制定了一些政策,行得通行不通,你回家去看看。”毛泽东通过陈长江,把视线投到长江北岸的南通。于是,海安的夏收秋种,农村养猪等家庭副业的发展,点点滴滴,都记在毛泽东的心中。

(图片由南通市政协提供)



江海风物

□孙同林

竹篮,就是用竹子编成的篮子。竹子劈成竹篾,竹篾再穿成篮子。竹篮的种类很多,有大有小,有圆有方,精致的可用来洗菜、淘米、洗衣服;也可用来上街装货物、装礼品;粗糙的采草时可用于装草,也常用于装收获的玉米、花生、山芋、芋头等物。竹篮在各地的叫法五花八门,什么猪头篮子、猪头拉儿、淘箩儿、淘米箩儿、方篮儿、米式拉儿、方拉儿、撇拉儿等等,等等。

民间曾经流传一个关于竹篮的联语故事,说的是清代散文家方苞小时候的事。方苞小时候就很聪明,七岁那年的一天,方苞跟大人一起下地,地里人们正在拔秧,内中有一人有点文化,知道小方苞天资聪颖,有意考考他,便以拔秧为题出个上联要他对出下联。那人给出的上联是:“稻草捆秧父抱子”,方苞听了,思忖道:“稻草,父也;秧,子也。”他一边思忖,一边向远处眺望,恰好看到不远处竹林中有几个女子正在掰竹笋,她们把掰下的竹笋朝篮里放,触景生情,他立即大声说:“有了,竹篮装笋娘怀儿。”众人听了,觉得此联简直是个绝对,天衣无缝,无不啧啧称奇。竹笋只有长成了竹子,才能用于做竹篮,因此,说竹篮是竹笋的母亲恰如其分。

乡间有一条歇后语比较流行,叫做:“竹篮打水——一场空。”这个歇后语主要体现了竹篮漏空的特征。

乡里人家用竹篮的地方很多。那时人们的家具很少,几乎没有盛东西的容器。一般人家都有个小竹园,到竹园里斫一些竹子,请竹篾匠回来做几只竹篮,容器就有了。为了让竹篮各司其职,也就有了多种造型,有扁形的,就叫撇拉儿;有方形的,就叫方拉儿;有半圆形的,叫淘米箩儿;有粗笨形状的就叫猪头篮子,等等。日常所装物品多是有分工的,吃剩的饭只能装在淘米箩儿里,过年储存的年糕和馒头比较多,就装在大篮子里,刚煮熟的山芋、芋头等就装在撇拉儿里,还有过年腌制的一点咸肉咸鱼就装在一个方拉儿里……

当年的农家,房梁上总是系着一排钩子,那就是用于挂竹篮的,挂竹篮的地方简直就是农家的一个小小仓库。

系钩子的材料最好选用铁丝(这样能防老鼠攀爬),上面固定在屋梁上,下面系钩子。讲究的人家钩子上面还要罩上一块硬纸板,这样,钩子上有硬纸板遮挡,竹篮的周围又是透气的,食物放在竹篮里面,既能通风不容易发霉,又可避免落上灰尘。在那物资匮乏年代,人们为了保存点食物算是费尽了心机。

特别是那些盛咸肉咸鱼的竹篮,因为这些东西平时舍不得吃,要留着见人待客,这些东西放的时间就比较长,所以必须挂得好,挂得安全,就要挂得相对高一些,这样既能防老鼠,防猪,还能防馋嘴的孩子。

我家装食物的竹篮,大多由我的母亲掌管。母亲负责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事宜,衣物、食物、用物,什么她都要精打细算。如果馒头、年糕被孩子们悄悄偷吃了,年后春天的日子安排母亲心里就没底了,一家人就有可能忍饥挨饿。有时,钩子上还可能会挂一点送人家“产妇礼”的时候,人家回回来的一点油馓子或脆饼之类,那里便成了孩子们关注的目标。

母亲是大公无私的,她保管竹篮,也就是保管着我们一家人的口粮,保护着我们的肚子,我们的明天。日子再艰难,再困苦,母亲也没有让我们家断过炊,虽然我们挨过饿、挨过冻,有时甚至会饥肠辘辘,会饿得两眼发黑,但我们终于活下来了,而且活得很快乐。因为母亲用房梁上的那一排大大小小的竹篮,让我们对生活有了依靠和希望。

竹篮曾经陪着我到野地里挖过野菜,竹篮也曾经陪着我在地里掰过玉米,竹篮还曾经陪着我到地里摘过瓜,摘过菜,收过山芋,竹篮更多的时候陪我采猪草、羊草,有竹篮相伴的日子其实是很开心也是很充实的。

挂在老家房梁上的竹篮,与老屋里斑驳的土墙,与罩着许多蜘蛛网的土灶,与已经摇晃不堪的雕画老床以及锄头、镰刀等等农具,成了我童年里难忘的记忆,竹篮也装载着我们曾经岁月里的饥饿和等待,盛满了我们这代人儿时的许多辛酸和欢乐。

现在,农家所用竹篮的地方越来越少,乡间的竹园也几乎成了凤毛麟角,甚至于连竹篾匠这种职业人也已经“退休”或改行了,乡间没有了做竹篮的人,农家要用一只竹篮就只能到街上买,那是些什么竹篮呢,或者是山竹做成的枯黄色的,或者是编织带制成的灰褐色的,也可能是那些很鲜亮但却千篇一律的塑料的篮儿,这些篮子只是徒有了篮子之名。只有当年老家那种带着竹子味道的青碧的竹篮,才是我们心中活色生香的真正的竹篮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旧时如皋的酿酒业

□程太和

习俗杂谈

如皋酿酒业历史悠久,城乡均有酒作坊。

明末清初,如皋城里酱酒号中有“三鼎、一大昌、八大家”之说。即:鼎茂、鼎源、鼎盛、徐大昌、严长泰、严恒泰、严进泰、石德昌、南祥发、北祥发、袁同泰、祥盛等。这些酒糟作坊均为前店后坊。其中徐大昌有职员16人,年产米酒、陈元酒、蜜酒2000坛(每坛25公斤)。

清末,如皋全县所产酒类品种繁多,据民国初《如皋县志》载:“如皋三白酒,城中家酿第一。元枯(即陈元酒),城中市沽之佳者,岁久愈厚。次曰老枯。”“甕头春,亦惟家酿者美”,“雪酒,出自蒲镇”,“安邑春,出自塘场(今属如东县),外枣儿红”,“薄荷露,出自塘、丰利、掘港(马塘、丰利、掘港,今均属如东县)。”“盛壁青,乡村多有之”,“蜜酒,药丸糁饭而成,谓之原浆”,“闭甕,乡村浊

醪”,“生酒,村坊所卖,谓之开生”,“烧酒,有糟烧、米烧、芦稷烧各种”,“药烧有史国公、长青、方应诸名”,“木瓜、玫瑰、沉香、乔饼、佛手露、竹叶青、葡萄等以上皆以物浸”,“冰雪,冰糖所浸,出于丁家所(今属海安市李堡镇)”,“乌龙,乌梅所浸”。

清末至民国时期,如皋城里有特色的酒业商号有永康祥、进泰酒栈、惠泉糟坊。永康祥,创设于清光绪前期,店址在如城大街朱衣巷口南侧。三开间大门面,西半部设柜台营业,东半部排列酒坛并放桌凳,供喝零酒,俗称喝“碗儿酒”的客人坐饮,店后为酒糟作坊。店主吴筱亭,后由其子吴敬贤继承,经营所售之酒均为质量上乘之品,深得顾客好评。尤以自家创制的“五加皮酒”和“国公酒”有名,因质地优良,配以秘传药料,有祛病健身益寿之功效,名声远扬,销路旺盛。清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店主吴筱亭将“五加皮酒”和“国公酒”参与“西湖博览会”展览,被评为优质产品。宣统二年(1910年)“南洋劝业会”再获展览会“白烧酒”,俗称“大麦冲子”。宿迁“高粱大曲酒”在如皋市场销售后,颇受客户青睐。

进泰酒栈,创设于光绪初年,店址在中市鱼市口东,店主程晋生,宿迁县仰集镇人,在仰集设有“福泰恒”糟坊,酿造“高粱大曲酒”。进泰所售酒的酒都由宿迁仰集运来,是出酒名乡的道地产品。其时,如皋市场销售的酒,大多来源于如皋乡村“小糟坊”以大米为原料酿成的“白烧酒”,俗称“大麦冲子”。宿迁“高粱大曲酒”在如皋市场销售后,颇受客户青

睐,此后,凡喜庆酬酢,馈赠亲友大多选用

“高粱大曲酒”。这独家专营酒栈,资力雄厚,货源充足,营业旺盛,盈利颇丰。不久,在如城南大街烟店巷口设分栈,称“南进泰”,在县署西大街亦设分栈,称“西进泰”。两店除主营曲酒外,增加经营酱货,于丰乐桥南东河旁设糟坊酿造,以节省运输费用及途中损耗。民国初年,由程晋生之子程其相继承,卢子白、张秉之为管事(即经理),四处开店、工人30余人。后因业主社会交际较多,私用奢侈,疏于业务,同时各店管理松懈,漏洞百出,至民国10年(1921年)后衰象渐露,只是底子深厚,尚能勉力支撑。年复一年,最终在如城沦陷后各店及糟坊先后歇业。

惠泉糟坊,创设于民国29年(1940年),店址(坊址)在如城丰乐桥南东河边,酿造“高粱大曲酒”。坊主程方岩,苏北沭阳人。惠泉糟坊所酿“高粱大曲酒”,品质优良,质量上乘,深受顾客赞赏。40年代中后期,惠泉糟坊月产酒4000~5000公斤,以金星牌“惠泉大曲”为商标销往上海及苏南等地。